

# 乾隆“高宗”庙号贬义色彩新考

丁少帅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 浙江 绍兴 312099)

**摘要:**近年来网络流传嘉庆为报复乾隆太上皇时期“让位不让权”,故意上与宋高宗相同的“高宗”庙号以示贬义。对此,本文依据史料与制度进行辨析,指出该说法不成立。首先,庙号评定遵循谥法本义,并非“判例法”,不会因前代君主德行优劣而避讳。明仁宗、明宣宗等庙号,前代使用者评价不高,明清仍正常使用。其次,乾隆生前已明确告知军机大臣,自己身后当称“宗”不称“祖”,嘉庆遵循遗训,并无违背。乾隆去世当日即定庙号,并非蓄谋报复,而是为迅速稳定政局、处理和坤事宜,且在乾隆旧臣环视下,嘉庆无擅自贬损先帝的空间。清代“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规制明确,康熙称“祖”有特殊政治背景,嘉庆不具备效仿条件。且清朝太庙实行万世不祧,乾隆无需为庙号争“祖”。所谓“高宗”含贬义、讽刺宋高宗之说,源于后世附会与小说演绎,并非史实,仅因宫廷秘闻色彩而广泛传播。

**关键词:**乾隆;清高宗;嘉庆;和坤

**收稿时间:**2026年3月13日

**中图分类号:**G03

**通讯作者:**丁少帅,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

## A New Study on the Derogatory Connotation of Qianlong's Temple Name "Gaozong"

Ding Shaoshuai

(Lu Xun Research Institute, Shaox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99,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n online view claims that Emperor Jiaqing intentionally gave Emperor Qianlong the temple name Gaozong to insult him, in retaliation for Qianlong's keeping power after abdic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this paper refutes this view. Temple names were chosen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al posthumous principles, not determined by previous negative examples. Renzong, Xuanzong and other titles were still us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spite being adopted by earlier rulers with poor reputations. Qianlong had clearly ordered that he should be titled Zong rather than Zu, and Jiaqing followed this instruction strictly. The temple name was decided immediately after Qianlong's death to stabilize the court and handle Heshen's case, leaving no possibility for intentional belittlement. The Qing system distinguished Zu and Zong clearly, and the imperial temple allowed permanent enshrinement. The claim that Gaozong is derogatory comes from later anecdotes and fictions, not historical reality.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Gaozong of the Qing; Jiaqing; Heshen

近来网络媒体对于嘉庆给乾隆追赠“高宗”庙号带有贬义色彩,乃是嘉庆为了发泄乾隆长期对于他实施高压管控进行报复的传闻争吵的沸沸扬扬。从而使得媒体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嘉庆不但将计就计的不给乾隆追赠带有“祖”的庙号,还追奉了与乾隆最讨厌的宋高宗相一致的“高宗”庙号,这是嘉庆故意针对乾隆作为太上皇的三年间“让位不让权”的逆

反心理,存在有一定的报复性目的,加之乾隆本人对于雍正相对刻薄的态度,更加坐实了这种猜想的准确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太高中世”四字是皇帝庙号的顶级词汇,嘉庆在选择的过程中明确表示皇考“圣哲多能,聪明天纵”,且“武功之极于无外也”,名曰守成,实为开创,考虑到自己的父亲曾亲自跟军机大臣表示庙号应该上“宗”而不是“祖”,在仅剩的庙号中,仁、宣、孝、穆、文、武等庙号都不能准确概括乾隆的功绩,因此只能选择“高宗”作为庙号,属于无奈之举,并不是所谓报复性心理作祟的结果。从传播的程度来看,似乎前者流传性更加广泛一些,大众仿佛对于这种宫廷父子不睦的趣闻似乎显得兴趣更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仔细翻阅史书,就能发现所谓报复“高宗”的观点几乎都不能成立,仅凭现存史料,根本无法判断出嘉庆给乾隆追赠“高宗”乃是故意为之的行为。

### 1 庙号使用判例法情况考辨

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庙号本身都是带有褒义色彩,因此现实中要判断所赠庙号是否真的带有褒贬,就要看前面使用这个庙号的君主德行如何,这在法律上被称为“判例法”——如何判定主要参考自最高法院之前所裁定类似案件。例如唐中宗之后,中宗的庙号就被带坏,后面的皇帝就不愿意再使用中宗作为庙号了。不过这个观点看似符合常理,实际上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参考前代帝王拟定庙号只是我们后人一厢情愿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朱高炽驾崩以后,朱瞻基给其父亲追奉的“仁宗”庙号。据《明史》记载,朱高炽本人“在位一年,用人行政,善不胜书”<sup>[1]</sup>。相传朱元璋曾考察秦、晋、周三国世子,询问他们:“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只见朱高炽不慌不忙地坦然回答道:“恃圣人有恤民之政”<sup>[2]</sup>。可见“仁”这个字非常符合朱高炽的个人形象与性格。如果按照判例法的规定,那就需要参考上一个“仁宗”皇帝的事迹——也就是元仁宗,史书记载元仁宗重视国学,恢复科举,要求“有才德者不拘品级”,是一个勉强合格的皇帝,但他却有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元仁宗的皇位来自于其兄元武宗,两人本来约定兄弟相袭,元仁宗驾崩后本来是要传

给自己的侄子,然而元仁宗却不顾众人反对强行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是为元英宗。元英宗在位期间,锐意改革,削减对于诸王及勋贵的赏赐,最终导致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元英宗在从上都回到大都的路上遭遇铁失等人的政变,遇害被杀。元英宗的死,一般被认为是元仁宗择选储君时违背兄弟约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朱高炽与朱高煦也有着一段手足阋墙的经历。朱高炽的兄弟朱高煦得宠于朱棣,根据《国榷》引林之盛的评论说:“解公(缙)之善悟主也。始言太子(高炽)之仁孝以动之,继言太孙之颖异以坚之,据以正法……不然,以汉王(高煦)之武,兼之以功,文皇帝(棣)喜其类己,而诸臣又左袒之,百喙不能移者”<sup>[3]</sup>。如果此时尊奉庙号是以“判例法”为原则,那么朱瞻基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给自己父亲上一个“仁宗”的庙号,这不仅表明自己皇位来路不正,还在暗示自己可能在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非自然死亡,这是朱瞻基所决不能容忍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朱瞻基的身上,朱瞻基登基之前的几个皇帝,使用“宣宗”作为庙号的皇帝都不太好。其中名声最好的唐宣宗李忱,被誉为“小太宗”。实际上李忱的评价非常两极化,赏识他的人将他统治期间称为“有贞观之风”,贬低他的人将他的统治期间称为“皆亡国之符”。李忱驾崩后,李漼继位,国事日渐衰亡,农民起义不断。经过李漼、李儂二人的统治,唐帝国彻底丧失管控能力,名存实亡。唐宣宗李忱之后被尊为“宣宗”的则是金宣宗,金宣宗在位期间昏招迭出,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北缺南补”的政策,在抵抗蒙古进攻的过程中,同时与南宋开战,从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加速了金朝的灭亡。而且,金宣宗在位期间不顾众人反对,以中都(今北京)缺粮为由,执意迁都南京(今开封),后世对于金宣宗的评价也都集中于“性本猜忌,崇信谄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绝非赞誉之词。“宣宗”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庙号,但是使用它作为庙号的皇帝都处于王朝末期,包括此后的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一般传不及三世政权就分崩离异,明宣宗传位明英宗之后,也险些由于“土木堡之变”而让帝国中途夭折。严格意义上,若是按照“判例法”来说,绝非好的庙号,嗣皇帝在给大行皇帝上庙

号的时候理所应当给予回避，不过明清两朝都没有回避这个庙号，再一次证明了明清两朝尊奉庙号是依照“判例法”的观点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唐中宗之后，中宗的庙号就被带坏，后面的皇帝就不愿意再使用中宗作为庙号的这个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两点：第一，唐朝之后并没有皇帝适合“中”字这个庙号，根据记载“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唐中宗李显虽然在政治上碌碌无为，还纵容韦后乱政，但是他在名誉上却仍然实现了李唐王朝的复兴。《资治通鉴》记载：“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唐朝之后能够算的上是“中兴”的皇帝并不多，如弘治中兴、同治中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兴”，故而“中”字就被搁置下来，没有再继续使用。第二，唐宋辽金元各朝的许多庙号都已废弃不用，并不只有“中宗”<sup>[4]</sup>。唐朝有睿宗、玄宗、肃宗、顺宗、敬宗等，辽朝有景宗、圣宗、兴宗等，宋朝有真宗、哲宗、理宗等，金朝有熙宗、章宗等，元朝定宗等，这些庙号的持有者有的贤明，有的昏庸，单独拿出唐中宗李显来看，他确实不能算非常优秀的帝王，但那是站在历代帝王的视野角度进行判定的缘故，其在唐朝帝王中的恶迹并不算特别突出，此后王朝中绝对没有理由因为李显的缘故，而不给一个相对平庸的君主追赠一个“中宗”的庙号，例如宋真宗、宋英宗，二人的政治水平都接近于李显，只是由于“中宗”这个词汇的含义过于特殊，不便随便使用而已。因此这绝对不是说某个皇帝用坏了这个庙号，后世便按照“判例法”不再继续沿用那么简单。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庙号所使用的字，或许是暗含有“谐音”的情况存在，比如“玄宗”“神宗”“敬宗”“顺宗”“代宗”“光宗”等，但这只是针对于文字本身的谥法含义的某种补充，属于合理联想。庙号以外，在谥号中也比较类似，例如刘协的“献帝”，李儿只斤·妥欢帖睦尔的“顺帝”，这并不会根据前朝帝王的事迹随之发生更改，否则嗣皇帝（改朝换代除外）就要背负“不孝”的骂名，这对于维护自己统治极为不利。

## 2 乾隆欲尊“高祖”庙号争议

乾隆是否想要给自己上一个“高祖”的庙号

呢？这是网络上的一种谣言，因为他们认为“高宗”已经被赵构玷污，以“祖”替“宗”，理所应当乾隆想给自己留一个“高祖”的庙号。这种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若是按照他们认为的“判例法”之原则，前面使用过“高祖”作为庙号的还有司马懿和石敬瑭，这还不算上陈友谅的这种伪号。司马懿在明清时期的形象不高，清人笔记小说《两般秋雨庵随笔》更是评价司马懿等人为“皆党奸之尤者”。石敬瑭直接在法理上面割让了燕云地区给辽朝，在历史上的评价丝毫不比宋高宗赵构好，他们的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乾隆想给自己争一个“高祖”的庙号。

乾隆真的想给自己争个“祖”的庙号吗？这个说法来自于《清仁宗实录》，原文是“曾同军机大臣等，共承面谕，万年之后，当以称宗为是。予虽欲极意尊崇，不敢上违遗训”。如果过度解读这句话，好像是能够认为乾隆在以退为守，疯狂暗示群臣自己想要“祖”的庙号。但是问题在于，乾隆下达面谕时的语气和态度都是完全没有记载的，乾隆当年也说过“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绍膺宝位，不敢仰希皇祖”，这两种政治许诺比较接近，之后在乾隆六十年时，尽管存在着诸多不情愿，可他仍然在表面上完成禅位，实现了先前的诺言，当时乾隆已经统治帝国六十年之久，有许多理由可以直接选择无视前面的任何承诺，相同的道理为何放到庙号上面反而就成为了乾隆进行以退为守的政治作秀呢？这于情于理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sup>[5]</sup>。

再来看一下嘉庆发布这道谕旨的时间，更是存在诸多蹊跷之处。清朝历代皇帝追尊帝王庙号的时间从来没有如此之快。比如顺治皇帝是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去世，直到21天后的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众人才议定皇帝庙号为世祖。康熙皇帝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直到11天后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众人才议定皇帝庙号为圣祖。雍正皇帝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去世，直到21天后的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众人才议定皇帝庙号为世宗。可见清代皇帝庙号的时间基本在10天以上，甚至到嘉庆本人去世后，庙号的议定更是长达30天之久。唯独

乾隆去世后，嘉庆在当天，也就是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的谕旨中就议定了乾隆的庙号为高宗，仿佛是有蓄谋已久的感觉。但时间越快，就说明给乾隆的庙号越没有任何问题：第一，嘉庆在乾隆死后身边几乎没有任何亲信势力，他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的儿皇帝，可乾隆非常猜忌儿子，还迟迟不肯召朱珪入京，因此嘉庆只能选择韬光养晦。这个时期留给嘉庆的班底，都是多年跟随乾隆的老臣，如果在议定庙号的问题上面嘉庆敢耍什么小聪明，一定会遭到群臣的反对，哪怕是帝师朱珪恐怕都不能答应。第二，议定庙号的时间如此快速，主要是为了着手解决乾隆的宠臣和坤的问题，要以正当理由软禁和坤。根据《李朝实录》记载，乾隆在正月初三日病逝后，次日，“正月初四日，即褫和坤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寝殿，不得任自出入”<sup>[6]</sup>。5天后的正月初八日，嘉庆下令“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紧接着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罗列罪款，嘉庆宣布将和坤下狱问罪，到正月十五日，一共历时12天，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对于和坤的收押，乾隆朝最大的宠臣贪官和坤宣告正式垮台。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风云波诡，在没有完成对和坤的控制之前，嘉庆如何敢于在乾隆去世的当天便通过透露出某种不满的态度，来给和坤的党羽充足反应的时间，从而使自身安全遭到不必要的危险，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行为。

有人肯定认为清朝已经破坏了定立“祖”的规定，多定几个“祖”也没有任何关系。这肯定是不对的想法。给康熙定“圣祖”庙号是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康熙朝晚年受九子夺嫡的影响，雍正必须以“孝顺”来标榜自己继位的正当性，嘉庆则没有相同的政治需求。即便如此，给康熙议定庙号的过程中，雍正还是显得极为心虚，在直接定调“朕意宜崇祖号”以后，又命令群臣商议，最终确立“圣祖”的庙号。雍正还反复解释为何议“祖”不议“宗”的想法，对群臣讲道：“诸王大臣官员，俱悉我皇考一生神圣实行。同心合词恭上尊称，无一人异词，甚愜朕怀。朕之哀思，庶可稍释。”清朝加上康熙，一共有三个祖，分别是太祖、世祖、圣祖，被人戏称为“祖”已烂大街。其实，一个朝代之中，三个祖的现象还有很多，曹魏的曹操、曹丕、曹

叡就是三祖，南朝刘宋、北朝北齐都有三祖，出现四祖的王朝则有北魏，分别是太祖拓跋珪、世祖拓跋焘、显祖拓跋弘、高祖拓跋宏，故而清朝并不是称“祖”庙号最多的王朝。不过雍正之所以如此谨慎，还是由于大一统王朝中通常最多只有两位“祖”，三位“祖”都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正是这种原因，也一定会让乾隆果断放弃称“祖”的念头。

同时，“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庙号固然重要。但在封建帝王眼里，如何能够永远在祖庙中“万世不祧”才是关键。不然历朝皇帝恐怕都想争一个“祖”字，难免出现像曹叡那样提前预订的情况。庙号与“万世不祧”早已分离，没有必然的联系。《三国志》记载：“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sup>[7]</sup>。”似乎让人产生一种“祖”才能进入“二祧”的错觉。这里还需要再纠正一个谣言，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嘉靖为了给自己父亲争一个位置，将朱元璋登基之前德祖移除，至此，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已经全部被移入祧庙，太祖居中，终于是给自己父亲升祔到了太庙之中。不仅如此，为避免自己死后，后代提前将自己父亲移出太庙，干脆升“太宗”庙号为“成祖”，成为“万世不祧”之君，绕过朱棣，提前把仁宗朱高炽移出，给自己留了个位置。此时明朝太庙排位正中间的是太祖朱元璋，昭为世祖、英宗、孝宗、武宗，穆为宣宗、宪宗、睿宗（追封），以及尚未驾崩的嘉靖本人。所需要纠正的是“祖”“宗”并不是“不祧”的认定标准，唐朝时期，太祖、高祖、太宗就获得“不祧”资格，北宋时期，太祖、太宗、真宗、僖祖先是“不祧”之主，此后仁宗、神宗、高宗都获得过“不祧”的资格。嘉靖之所以改朱棣的庙号，使其获得不用迁祧资格的传闻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此之前，朱棣应该便已获得“不祧”名额。而嘉靖的目的是为了让其父亲睿宗享受明堂大享配祀的资格，从而把太宗朱棣逐出配祀的行列。《明史》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既排众议，崇私宗，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sup>[8]</sup>。”将“宗”改“祖”是一种补偿“太宗永无配享”的做法，与迁祧德祖、仁宗出太庙的关系不大。这时，“今两郊及祈

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嘉靖亲自以“天惟一天，祖亦一祖”的理由将太宗移出郊祭之列（建文年间以太祖配，洪熙年间增以太宗配），仅仅恢复“配祀于孟春祈谷”，最终将堂祭配帝成功转移到自己一脉。此外，清朝太庙没有遵循传统七庙（或九庙）制度，清朝帝王每个都享受“万世不祧”的资格，祖、宗的庙号概念早已大为削弱。乾隆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自己被移入远祖庙而争一个“祖”的虚名。

清朝皇帝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于制度可以随意更改。比如清朝皇帝册封皇后的数量通常不会超过3位，加上追封达到4位的也只有顺治、康熙、道光，其中顺治的4位皇后还包括了1名废后和追封的董鄂妃以及康熙生母佟佳氏。可见清朝皇帝不能根据意愿想封几个皇后就封几个，这几乎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祖宗成法，限制着皇帝的行为。包括庙号也不例外。关于乾隆庙号含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早在二十一世纪初高阳所写的小说《水龙吟》中就有所体现，原文是：“‘高宗？’皇帝有些踌躇，‘唐高宗、宋高宗似乎都不怎么样。’‘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刻像以求四方贤哲，凡此武功文治，太上皇足以媲美古之圣君。’”这种比拟唐高宗、宋高宗的论调，并没有在当时的清史学界激起任何水花<sup>[9]</sup>。直到网络媒体的兴盛，这种观点又被重新提起，还成为了一种颠覆传统观念的“新看法”，实际上却经不起反复推敲。有趣的是，不仅是庙号，追封的谥号也是如此。太和三年（229），曹叡追封曹腾为高皇帝。明清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努尔哈赤的谥号都用了高皇帝，甚至努尔哈赤还从初谥的武皇帝改为了高皇帝。曹腾是一名宦官，真要是同样按

照“判例法”的原则，估计两位帝王的谥号也终究难逃被奚落嘲笑的下场，这岂不成了个笑话吗？

最终还要再说一句，乾隆自视甚高，自称“十全老人”，他认为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勉强算是合格的皇帝，哪怕就是其认可的宋仁宗，也在《御批纲鉴》中痛批：“仁宗不能明正大义，抵之以罪，而顾谋之宦官，谋之执政……所为不益可笑哉！”又说仁宗“直是无丈夫气”。因此单独拿出乾隆批评宋高宗的话，就来证明乾隆最看不起宋高宗，只是为了罗列证据来证明嘉庆不孝的一种手段罢了，既不高明也不公正<sup>[10]</sup>。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等. 明史·本纪第八 [M]. 百衲本, 6b.
- [2] 张廷玉等. 明史·本纪第八 [M]. 百衲本, 1b.
- [3] 谈迁. 国榷卷十四 [M]. 抄本, 6a.
- [4] 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 [M]. 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1a.
- [5] 清实录馆.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十七 [M]. 刻本, 11a.
- [6] 朝鲜史馆. 朝鲜王朝实录·正宗庄孝大王实录卷五十一 [M]. 影印本, 37a.
- [7] 陈寿著, 裴松之注.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 [M]. 百衲本, 17a.
- [8] 张廷玉等. 明史·志二十四 [M]. 百衲本, 17b.
- [9] 高阳. 水龙吟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7.
- [10] 弘历批校, 梁长森主编. 乾隆御批纲鉴 (第5册)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4425.

作者简介: 丁少帅 (1996-), 男, 汉族, 山东潍坊人,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书法史, 越地艺术文化。